

福澤諭吉

(西元一八三五—一九〇一)

鄭瑞澤

一 童年



福澤諭吉是日本明治維新前後一位西方近代文明的啟蒙者和偉大的教育家。他於天保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元一八三五年一月十日），出生在大阪的藩邸。父親福澤百助，是豐前中津（現今九州大分縣）奧平藩的士族。母親是同藩士族橋本濱右衛門的長女，名叫阿順。他的父母一共生了兩男三女，諭吉是最後一個兒子。

當時，各藩都在金融中心地大阪和江戶（東京），設置「藏屋敷」，銷售藩地生產的糧穀雜物。百助受藩命，在大阪中津藩的「藏屋敷」，擔任會計的工作。他雖是一個俸祿微薄的低級藩士，但卻是一位廉潔自持、才學俊秀、德望頗高的漢學者。他最喜歡蒐藏中國的古書，恰巧在諭吉誕生那一天，得償夙願，購到了中國清代的上諭條例六十餘冊；晚上又逢麟兒出世，喜事重重，歡欣無比，於是給新生兒子取名「諭吉」。

但不幸終於降臨這個和樂的家庭。當諭吉十八個月大的時候，年僅四十五歲的父親就因病亡故。三十三歲的母親，不得不帶五個孩子，回到了背離十數年之久的故鄉中津。此地方語言風俗和大阪有些不同。孩子們無形中和故鄉的小朋友們起了一層隔閡，只好自家成為一個小天地，生活在其中。他們雖然過著寂寞窮苦的生活，家風倒是純直而和平的。

幼小時候的諭吉，飽受身分差別的屈辱，備嘗家計貧困的痛苦。但這些絲毫無損於他天生豁達的個性。舉例說：諭吉要上街購買酒、油、醬油時，不像其他小士族的子弟用手巾遮掩頭臉，在夜間出去購買。他不但不蒙面，腰間還帶著兩把刀，提著酒壺，白晝也昂然上街去買，而不以為恥。他該為一個人光明正大用自己的錢買東西，沒有甚麼不該，也沒有甚麼羞辱可說。從這個小地方，我們可以窺見他日後倔強的精神。

再說，諭吉十二、三歲的時候，有一天，走進屋裡，無意中踩住了他的大哥平鋪在室內的廢紙，引起大哥勃然大怒，挨受一頓教訓。原來廢紙上寫有藩主「奧平大膳太夫」的名字；殘踏主君的名字，有悖家臣之道。諭吉為了息事寧人，連忙謝罪，心裡卻頗不釋然。他暗忖著：臣民不小心踩踏了藩主的姓名是罪惡，必有果報；那麼殘踏寫有神名的神符，又當如何？為了試驗有甚麼報應發生，他居然暗自踩踏神符，也拿到洗手間去。此外，他也暗中掉換神社供奉的神體，竊笑善男信女膜拜的無知，揭穿天譴冥罰的騙局。他對於迷信的厭惡，以及不關心神佛的態度，似乎受了母親的影響。他後來由對門閥制度的反感發展成為批判諸事的態度，絕不是偶然的。當他追念他的先父有生之年懷才不遇

，慘作封建制度下的犧牲品，默默無聞終其一生，飲恨於九泉之下時，往往不禁黯然淚下。他認為「門閥制度是父親的仇敵」。由此可見，他對封建門閥制度痛心疾首的一斑。

二 少年

諭吉年少時居家，常製作手工藝品，換得餬口之資，貼補家用，無暇讀書識字。一直到了十四五歲，纔開始學習漢書（中文書籍）。從此以後，才華漸露，進步神速。

他具有豪邁不羈的性格，愛好自由的生活，對事物的觀察又細密入微。他自幼生長在門閥觀念極為濃厚的社會環境裡，十分厭惡這種生活，希望早日離開中津，擺脫門閥制度的枷鎖，另謀發展。二十一歲時，他如願以償，到長崎學習蘭學（荷蘭語文及學術）。

他去長崎的那一年（安政元年，一八五四年），日本與美國締結了和約。在前一年（嘉永六年），美國海軍軍官柏里（M. C. Perry）率領艦隊，駛進日本的浦賀港，不但驚醒了德川幕府二百餘年的鎖國美夢，也敞開了明治維新王政復古的端倪。日本在厲行閉關自守政策的時代，只有長崎一地可和荷蘭通商。當時學習醫學或砲術，都需要研讀蘭學原著。蘭學可說是日本人接觸西學、吸收西方文化的一個發端。

諭吉在長崎修業期間，寄居於砲術家山本物次郎的家裡做食客，半工半讀，勤勉苦幹，學習蘭學也頗有心得，深獲山本的器重；山本甚至想收他做為養子。這是諭吉畢生事業活動的開端。

但這樣一來，反而引起在那裡共同修業的同藩「家老」（家老是家臣之長，是日本封建時代的一個較高門閥階級）之子奧平壹岐的嫉妒，逼得諭吉不得不離開長崎。但諭吉並不因此而意氣用事，經過三思之後，決心到江戶去創天下。在旅途中，他吃盡了千辛萬苦才抵達大阪。那時，諭吉的大哥三之助承襲他先父的職司，在大阪中津藩的「藏屋敷」工作。諭吉向他的大哥表白遊學江戶的心迹，但終於聽從三之助的勸導，決定留在大阪，拜緒方洪庵為師，研習蘭學。

當時，緒方洪庵（一八一〇—一八六三）是一位蘭學大家，也被尊為荷蘭醫學的專家，懸壺於大阪。他開設的家塾叫做適適齋塾（簡稱適塾），是當時日本首屈一指的蘭學塾。塾裡經常有學生一百人左右，前後就讀於該塾的已超出千人以上。門生人才輩出，多有建樹。

諭吉於安政二年（一八五五）三月，進入適塾就讀。這是他按部就班，正式從師學習蘭學的頭一遭。在這以前，從沒有固定的業師，多半單靠自己的努力，偶然獲得別人的指點而已。從此以後，一直到安政五年受聘到江戶擔任教職之前，焚膏繼晷，潛心鑽研，自不在話下。不久，他被擢升為塾長。

在緒方塾，學問上的切磋，使得諭吉大放異采，嶄露頭角。同時，在待人接物方面，他也得到磨鍊的大好機會。安政三年初春，諭吉因為看護一個學友，自己也不幸感染了傷寒。多虧洪庵先生親自按脈診病，另一位醫師處方，悉心照拂，始得很快的康復如初。據說醫師診治自己子女的重病，往往拿不定主意。洪庵先生當時邀請另一位醫師會診，就是這種父母心腸的表露。洪庵先生對學生像父母

對子女般的愛護和照顧，使諭吉深為感動，所以他日後開辦私塾時，也深愛他的門生，常以金錢物品接濟家境貧困的學生。遇到學生久病初癒回到學塾，其歡慰逾常的神態，有如迎接生還的己子一般。

諭吉侍奉恩師和師母，始終如一；洪庵夫婦作古之後也是如此。明治十九年（一八八六）他到大阪掃墓，一抵達大阪，便匆忙上緒方府的墓園，捲起褲腳，用草繩當作刷帚，婉謝隨行人員的幫忙，親手把墓碑洗刷乾淨才叩拜。從這一則小故事，我們可以知道洪庵先生為人師表的偉大，同時也可以看出福澤先生做人的態度。他祭掃父母的墳墓也一樣，從清掃至上香，完全親自料理，不假人手；在家裡，開啟佛龕的門扉和奉獻供物種種，都自己做；這就是否定宗教的諭吉本人的行為；只有注意到這一層，我們才能確切了解不關心宗教的他的生活。

三 放 洋

諭吉在適塾修業期間，德川幕府的封建體制，急轉直下，搖搖欲墜；列強的勢力步步緊逼；地方上的各藩也紛紛以大藩為中心，斥責幕府的專政。他們認為政治的動搖，啟端於外國問題。這個問題是迫使時代變遷的基本動力。各藩為了自衛，為了準備應變，為了研究礮術和了解中外情勢，在在需要獎勵洋學的研究。江戶奧平藩也不例外。

安政五年（一八五八），諭吉二十五歲那一年，他接受奧平藩的徵聘，到江戶教授蘭學。江戶是幕府政治財經的樞要所在；處身其境，自然能夠密切觀察社會輿論的動向，注視局勢的演變。這對於

諭吉的一生，具有劃時期的重要意義。這所粗具規模的蘭學塾，設在江戶築地的鐵砲洲地方。它就是後來諭吉所創的慶應義塾的嚆矢。

諭吉認為大阪的學生在學問方面，所向無敵。這一次自己是以教師的身份來到江戶執教的，因此頗為自負。事實上，他曾經利用機會，試探過當地蘭學大家的學識，證實了平日所信的並不虛妄。誰知道，第二年（安政六年），他到橫濱觀光的體驗，對他無疑是一次殘酷的當頭棒喝，使他從自我陶醉中醒悟過來。當時橫濱依據日本與列強訂立的五國條約（安政六年），開闢為通商口岸之一，與外國人交易。他走遍街上各個角落所看到所聽到的，商店的招牌也好，瓶上的商標也好，或和別人交談也好，語言一竅不通。這對他好像是青天的霹靂，覺得數年來苦讀蘭學的努力，盡付東流。他即刻猛省到，蘭學已不能迎合時代的潮流。此時要補偏救弊，唯有立志勤學英語的一途而已。於是，他又開始廢寢忘餐，讀起英語來。因為多方求教適當的老師未果，不得不依靠僅有的蘭英對譯字典和蘭英會話等書，跟另一個朋友埋頭共讀。這樣開始學習之後僅歷半載，他有第一次極好的機會，隨幕府的使節前往美國。

安政六年冬，德川幕府依據日美通商條約的規定，決定派遣軍艦咸臨號，護送使節到美國華盛頓，交換商約。這是日本開國以來空前的壯舉。諭吉經過朋友的推介，獲得艦長木村攝津守的准許，做為一個隨員，終於能夠成行，到了舊金山和夏威夷等地。但這一次放洋，隨員的職務繁忙，除對美國外表的文明感到愕然之外，沒有太多見聞的機會，未能引起思想上重大的變化，僅僅攜帶一部韋伯斯

特大辭典回國而已。這是日本人輸入這種辭典的開始。

回國之後，諭吉接受木村攝津守的推薦，受雇於幕府「外國方」（即外交部），充任譯員，翻譯與外國往來的公文。當時，外國機關送達日本政府的公文，有添附荷蘭文的慣例，因此常有機會對照學習英蘭兩國文字，頗利於英文的研究。不久，諭吉廢除了家塾的蘭學，改授英文。學生人數與日俱增，但充為一所英文學塾，仍然微不足道。

在這裡，為了便於了解諭吉的為人起見，諭吉對木村所持的態度，值得一述。這一次赴美，木村在名義上把諭吉當作一名隨員，要他隨從到美國；但除了公務之外，都以朋友對待諭吉。諭吉卻為了報答他的恩情，終生以從者的禮貌侍候他。例如，木村曾經請諭吉為他的著作寫序文。但諭吉在序文中，甚至謙稱自己為「木村前艦長的僕從福澤諭吉」。此外，呈函給木村，始終顧到文體是否得體。每逢年節，必定端正衣冠，親往致賀。由此可見，他崇敬尊長、重視禮節的態度，不失為世人的表率。

四 倡導西學

諭吉從美國回來之後第二年（文久元年，一八六一），和藩士的女兒錦女士結縭。

同年十二月，諭吉又得到了一次遊歐的機會。當時日本的國內情勢，搖撼不定；因此，依據五國條約開闢港市的規定，有些部分無法實施。為了要和各國直接交涉，幕府決定派遣使節到歐洲。諭吉

被任為一名譯員，參加此行。

這一次旅歐，對諭吉的思想生活具有重大的意義。他所以能夠洞察文明和國家社會的關係，固然得力於平日的學習，但更有賴於這次旅遊的經驗。貫徹他的思想的愛國精神，似乎也淵源於此。這一次赴歐，他對於社會經濟各種問題，諸如醫院的經營、銀行的業務、郵政、徵兵法規、政黨、輿論或選舉等問題，都能做比較深入的了解。旅行一年期間，所見所聞，沒有一樣不是新奇的。和上一次在美國只觀察到表面壯觀的情形不同，這一次諭吉已能留意到歐陸各國內部的觀察，並作詳盡的筆錄。這次幕府派遣使節訪歐，並沒有甚麼收穫，但一行中偶然有諭吉參加，這對日本後來的發展，卻有非同小可的影響。回國之後，他根據這些筆記資料，另參考原書，撰寫了西洋事情初編（慶應二年，一八六六）。這部書好比一座警鐘，敲醒了民眾的矇矓，啟迪了無知的社會對先進文明國家的認識，甚至深刻地影響維新政府的政策。這部「西洋事情」共十卷（一八六六—一八七〇），發行部數約有二十五萬之譜。憂國愛民的人士，幾乎人人一部，把它當作金科玉律一般看待。但它的價值，不只在介紹歐西文物而已。此書是第一部諭吉嘔心的傑作，充滿著睿智的表現，顯示諭吉的思想體系初告成立。

諭吉自歐洲歸國後，國內的情勢不變，主張攘夷論者日趨猖獗。倡導開港論者被目為「神州的盜賊」，暗遭襲擊的事件，迭出不窮。為了避免惹禍，諭吉只好埋首於譯著工作。同時因時勢所趨，一般人對英語的需求日益殷切；諭吉所辦的家塾是江戶唯一的英文學塾，學生與日俱增。為了整頓蘭學塾紊亂的舊態，把它改設為學生的「修養所」，諭吉從故鄉邀請小幡篤次郎等數位青年到江戶，共同

經營塾務；諭吉又不忍心讓這幾位青年虛擲寶貴的求學時光去抄錄蘭書以獲得生活的需要，只好自己勉為其難，用自己從事譯述所得的稿費養活他們。從這裡我們也可看到諭吉的為人。

慶應三年（一八六七），諭吉隨從幕府的軍艦採購委員，再度赴美，考察了美國東部各州的都市。這前後三次的國外旅行，使諭吉深切體認到日本在國際社會上所處的地位，痛斥當時幕府的壓制政策和陳腐的門閥制度。這種體驗，決定了他於幕府末期到明治維新的一段轉捩期，在日本的文教舞臺上扮演的角色。回國之後，他更致力於從事教學和譯著工作，積極倡導西學，作育英才。

五 慶應義塾

諭吉的家塾原設在鐵砲洲。在慶應四年（一八六八）四月，遷到新錢座，同時取當時的年號，定名為慶應義塾。這是諭吉平生最偉大的事業的開端。

他仿效歐西私立學校的常例，訂定塾則，規定學費，確立課程內容，設立財團法人，銳意革新塾務。

諭吉主張義塾的教育方針應有兩方面：有形方面，以「數」「理」為基礎；無形方面，以培養「獨立心」為旨趣。易言之，論事以合理為準繩，言道德則以獨立自尊為立身行事的基本。如以東方的儒教主義和西洋的文明主義相比，這兩者都是日本所缺乏的；欲使日本能夠迎頭趕上歐美各強國，除鼓吹獨立精神及提倡實學之外，別無他途。

塾裡所用的教本，多數是諭吉從美國買回來的西書。除各種辭典、地理、歷史等書以外，還有法律、經濟、數學等書，分發給學生研讀。這是日本其他學塾望塵莫及的措施。

諭吉的教學精神，很令人敬佩。明治元年五月，上野發生戰爭，江戶頓時陷入混亂的狀態之中，市內的一切公共遊藝場所，全都收市，居民也紛紛避難。義塾所在地新錢座，距離上野約八公里，沒有飛來礮彈的危險。諭吉在遙聞礮聲而遠望礮煙的緊急情況下，依然從容地講授美國威氏的經濟學，一時傳為佳話。在兵慌馬亂當中，唯一能夠獨立其間，扶持泰西新學的命脈於不墜的，只有慶應義塾。諭吉堅忍不拔的辦學精神，於此可見。

當時，諭吉曾有一段勉勵塾生們的話，十分動人。他說：

「從前拿破崙稱霸於歐陸時，荷蘭國的命運，有如風前的殘燭，岌岌可危，不特自己的本國，連印度地方的屬地都被佔據，沒有一個地方可容它升揚國旗。但在世界上，還留著僅有的一個地方，那就是日本長崎的出島。出島是多年來荷蘭人在日本居留的地方。歐洲的兵亂影響不到日本。懸掛在出島的荷蘭國旗，常在百尺竿頭迎風飄揚，象徵著荷蘭王國從沒有淪亡過，這是荷蘭人一向引以自豪的。以此比喻慶應義塾提倡日本的西學，正如荷蘭的出島一樣，從沒有因為世間的任何騷動或變亂，而斷絕過西學的命脈！我們的慶應義塾沒有停歇過一天。只要這所學塾存在一天，日本就是世界的文明國家！……」這是何等偉大的胸襟！他的高風亮節，誠足令人肅然起敬。

諭吉對於塾生品行的陶冶，也很用心。戰亂平定後，塾生人數急遽增加，但多數是身歷戰役，剛

丟棄鎗械退伍下來的青年；他們性情暴躁，面目猙獰，行為狂妄，時有拔刀相向的情事發生。為了要整頓學塾的風紀，變化他們的氣質，諭吉制定了簡單的塾則，一面要求他們嚴守，一面自己也以身作則，躬行實踐，期以導納他們的生活於正軌。經過一番苦心，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學塾纔歸於井然有序，蔚為學術氣息濃郁的學園。

明治四年（一八七一），義塾遷到景色秀麗的三田（今東京都港區三田），學塾地基比新錢座設塾時代，已擴充到三十倍之多；學校的諸般事業也一日千里，欣欣向榮。今天享譽於國際的慶應義塾大學，就是諭吉當年草創的家塾，經過積年累月慘澹經營所換來的輝煌成果。

六 各種著作

福澤不僅是一位偉大的教育家，也是一位偉大的著作家。他的多產的著譯作品，和他創辦的義塾教育事業，兩相輝映，成為啟發日本民智的兩大法寶。他的大量的著述，在啟導一般國民的新知和建設日本新文化方面，都已發揮到了極致。

諭吉的著作浩瀚。他以犀銳的直觀，論述當時的日本國民熱中追求的新知，加上文體平易、內容通俗，字裡行間洋溢著俠骨稜稜的氣概，使當時饑渴的知識份子如獲佳餚甘泉，爭相閱讀。這種平易通俗的文體，豪氣縱橫的筆調，正是諭吉文章的特色。

他有這樣的造詣，固然由於辛勤耕耘而然，但他的老師緒方洪庵的翻譯法和蓮如上人的筆路，對

他都有深邃的影響。洪庵迆譯蘭文原書，很少一字一句毫不苟且地直譯。他憑著豪放的氣質，常取原書裡的要旨來翻譯，省去晦澀難解的詞句，行文以淺近暢達為主，期能達到翻譯的目的。同時諭吉也十分欽仰蓮如上人平易的文章，以及插入「假名」（日語字母）的文體；諭吉的文章也夾雜著「片假名」，以收醒目易讀和加強語意的效果，創造了獨特的風格。

諭吉的處女作華英通語，出版於萬延元年（一八六〇）。這是一本英語的單字和會話的書，用「假名」註音，漢字釋義。接著出版西洋事情一書，介紹西方的文物制度、權利義務觀念、和文教政經的實況。此外，影響力比西洋事情有過之而無不及的，便是小冊子「勸學論」，共十七篇，在明治五年到九年（一八七二—七六）之間陸續出版。它闡釋人權平等的精義，新學問的真諦，以及法治國家的國民應盡的職分等等。這部書開宗明義宣稱：「天未在人之上造人，亦未在人之下造人。」這句話好比神的啟示一樣，給封建桎梏下的大多數日本人，帶來無比的振奮。很多人因受這部書的啟導，恍然大悟個人的尊嚴，能在獨立自由的新天地間，獲得精神的解放。這部書，如以每篇銷行量二十萬冊計算，大約有三百四十萬冊傳布於日本民間。如此盛況，誠可用「洛陽紙貴」一詞來形容。

在明治八年（一八七五）和十二年相繼問世的兩本書，文明論之概略和民情一新，探尋古今中外文明發展的原因和變遷，闡述日後日本國民處在文明世界之中應有的生活方式和昌隆國運之道。這些書是最適合於了解諭吉的哲學、思想、歷史觀和國家觀的名著。

到明治十五年（一八八二），諭吉興辦了一種不偏不黨的日刊報紙，稱為「時事新報」。他親自

撰寫社論，竭盡了領導輿論的天職。時事新報的社論，有下列數種特色：針對當時的國際情勢，倡言「東洋政略論」；關於國內政治，主張「官民調和論」；以提高婦女的社會地位為主題，鼓吹「婦人論」等。他撰寫這些社論，都是站在公正的立場，以一個民權運動理論的領袖，積極推展啟蒙運動。他在晚年發表的「福翁自傳」和「福翁百話」，可說是他平生的閱歷和思想的總結算。

除此以外，他著譯的書不勝枚舉，前後共有六十餘部，論冊數，計達一百數十冊。諸如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歷史地理、制度風俗等固不待說；就是天文、物理、化學，或是兒童讀物、習字範本、修養叢書等，甚至連簿記法、兵器操作法或攻城野戰法等，都包括在內，範圍之廣，有如百科全書。在今天，這些絕不可能是出於一個人之手的。

七 學者雁奴

福澤諭吉生為日本的一個國民，無限地熱愛他的祖國。他遭遇到歷史上罕見的激變時期，本乎自己的忠貞與愛國的熱忱，挺身而出，肩負起時代的使命，企望完成書生報國捨我其誰的宿志。可是，他樂意做國民的一分子，和大眾同生活，在大眾中活動，對世上庸俗的榮華富貴卻不屑於一顧。維新政府為要借重他超倫的才識，曾再三請他出任政府的職位，但他淡泊名利，置若無聞，從不改變以一個平民終其一生的初衷。此外，為要表揚他畢生的豐功偉業，常有頒贈給他學位、勳章或爵位的倡議，但他總設法婉辭，始終沒有接受過。明治三十三年，日本朝廷特旨嘉獎，並賞金幣五萬元。諭吉把

這筆款項，悉數轉贈給慶應義塾充作基金。他是何等徹底堅守獨立自由的精神，於此可見一斑。

剖視諭吉的一生，他真不愧為一位典型的學者，終生不失教育家的本色。引用他自己的譬喻，說他是一隻忠心耿耿的「雁奴」，絕非言過其實。他曾經倡導「學者雁奴論」，認為學者是雁奴。群雁夜宿於江湖沙渚中的時候，動輒有千百隻聚集在一起。其中較大的安居中央，較小的在外圍司掌警戒的工作，防禦狐或人類前來捕獲牠們。這些從事警備的，稱為「雁奴」。學者也是如此。獨有學者能夠瞻前顧後，留神今生，展望來世；察人之所未察，言人之所未言；擇善而固執，為真理，絕不肯折腰；不因時勢的演變，隨波逐流，與世浮沈。其所發的言論，雖是逆耳的忠言多，卻有警世的餘韻縈迴。衡以諭吉生前的行誼，他似乎以一隻雁奴自任，引此以為榮。

諭吉畢生對於日本文化，有不可磨滅的貢獻：第一，以著述教導全體社會；第二，創設學塾，造就人才；第三，創刊新報，普及新知，擁護公論；第四，提倡演說和辯論，鞏固民權政治。這些事業，諭吉莫不營運自如，一帆風順。

明治三十四年（一九〇一）二月三日，諭吉終因宿疾——腦溢血症復發，與世長辭，享年六十八。噩耗流傳所及，日本全國上下，不問識與不識，都惋惜這顆巨星的殞落。他的逝世，確是日本最大的損失；全國的報刊雜誌，齊聲哀痛不已。眾議院也破例對諭吉發佈弔詞，使他身後備享哀榮。

福澤諭吉是日本幕府末期到明治時代，一位新思想的先驅，領導日本文化的大功臣。他的英名在日本文化史上有口皆碑，流芳萬世。

一位卓異的日本教師，在明治維新前後，日本史上空前的動盪顛簸時期，如何竟其生涯？他的生活態度怎樣影響那個時代？時代的變遷又怎樣影響他的成長？時代和個人有甚麼相互關係？能不能夠靈犀一點通，從這位人物畢生的言行中，領悟到我們個人應該有的作為和生活方式？這是一個很值得世人深思的重要問題。

本文參考書：

- 福澤諭吉（昭和三十三年）。福翁自傳。（富田正文校注解說）。慶應通信。
- 石河幹明（昭和十年初版）。福澤諭吉。東京：岩波書店。
- 石河幹明（昭和七年初版）。福澤諭吉傳。東京：岩波書店。
- 高橋誠一郎（昭和二十二年初版）。福澤諭吉。實業之日本社刊。
- 伏見猛彌、阿部仁三（昭和十二年）。福澤諭吉（日本教育家文庫第四十卷）。北海出版社。
- 福澤諭吉撰，時事新報社編（大正十五年）。福澤全集。東京：國民圖書會社。
- 續福澤全集（昭和八年）。東京：岩波書店。

華德 (西元一八四一—一九一三)

林清江



華德 (Lester F. Ward) 身高六尺，肩寬體健，頭髮濃密，皮膚呈金銅色，神態凝重，頗有深思明辨的風采。及至晚年，仍然健步如飛，平日喜穿黑色長外套，戴著低垂的帽子。他一生奮鬥的經過，具有無窮的教育意義；他擔任教師及教授的時日，為人稱道；他的主要思想，使人瞭解教育有它的社會目的及功能。

生活背景

華德於一八四一年六月十八日生於美國伊利諾州，父親為磨坊工匠，同時從事一般性的機械工作；母親是一牧師的女兒，秉性善良。華德生長在一個流浪的環境中；他的雙親帶著八個兒女，從紐約西向印第安那州拓荒的旅途中，生了第九及第十個孩子，其中第十個便是本文描述的華德。

華德幼年生長在卡斯 (Cass) 地方，九歲時才在該地就學。由於本身家境清寒，學校中如有任何競賽，他都希望較貧窮的子弟能夠獲勝。這種態度至其成年時，多少仍然存在，影響其思想。由於當時學校簡陋，教材簡單，華德在此一階段所接受者，大都是與大自然接觸的非正式教育。他觀察磨坊

及農田的工作，增進自己的知能。這就是華德接受教育的開端。

一八五二年華德年屆十一歲時，他的家庭遷往一個叫做聖·查爾斯 (St. Charles) 的地方。在這裡，華德的雙親獲得較多宗教及社會活動的機會，華德和他的哥哥也能共同就學，接受比以前稍好的教育。就在這一階段中，華德開始喜好詩歌及文學，同時對於語言的學習，也發生濃厚的興趣。也就在這一時期，華德的父親在住地附近購買了磨坊及土地，華德對於磨坊及農田的接觸又加深了一層。華德在這個地方學習溜冰、游泳、釣魚、逐鳥，整日面對大自然，徜徉於山水之間，對於大自然產生了深厚的感情；同時由於接觸自然環境及各種動植物，他體悟到：大自然是可以被控制的。這是華德以後主張人類利用知識控制自然現象的思想根源。

一八五五年，華德的家庭又往西部遷移，他們利用蓬車跋涉旅途長達兩月，父母夜宿蓬車，華德兄弟則露宿地下。華德在旅途中奔跑運動，攜槍射擊禽鳥野兔。他喜愛風雨、大雪、陽光，並且隨身帶著小冊子，記錄他所接觸的動植物。當時華德並沒有動物學、鳥類學、昆蟲學、及生物學的知識，但是他喜愛大自然的一切。華德回憶當時的情況說：「我想我是一個天生愛好自然的人，但是使我成為科學家的機會卻相當少，主要的原因是沒有老師及書籍。」這不僅是華德自己的回憶或感嘆，同時也是他教育背景的的最好寫照。他早年所接受的教育，是仰賴自習及自己奮鬥的學習，是一種真正的自我教育。

華德的父親辭世以後，他的母親再率家人遷往伊利諾州。在新地方，華德受僱於農田工作。他的

僱主曾居留於加拿大法語區，能說法語，華德從他那裡借得法文書籍，夜間由同事協助閱讀。其後華德又獲得就學機會，正式學習代數、幾何、文法課程，同時又自習其他學科。

一八五八年，華德年屆十七歲時，偕其兄伊拉斯塔斯赴賓州會晤其另一兄長奧斯本（Osborn），並在其兄長所擁有之工廠擔任技師，暇時則進修生理學、德文、法文及拉丁文。

一八六〇年至一八六一年間，華德曾在學校任教，其後又再度就學。就學期間，華德發現自己希臘文和拉丁文的程度冠於全班，由此再進一步，深入研究古典文學及詩歌。

稍後華德本擬就讀學院，但因美國內戰發生，應召服役，在軍中前後二十七個月，受傷兩次，一八六四年十一月因三處槍傷未癒，獲准離開軍旅。

次年華德結束奔勞的生活，在華盛頓定居，並擔任政府公職。為了彌補自己不完整的教育，華德在服公職期間半工半讀，至一八六九年獲學士學位，當時年已二十八歲。兩年後華德再獲得法學士學位，並取得律師資格。一八七二年，華德獲得碩士學位及醫學文憑。他自己說，良知不允許他從事法律及醫學工作，而要求自己從事社會學研究及教學工作。

華德於一八八三年出版「社會動學」，一八九二年出版「文明的精神因素」，一八九七年出版「社會學大綱」，一九〇三年出版「純理社會學」一九〇六年出版「應用社會學」。一九〇六年華德受聘執教於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擔任社會學講座教授，同時擔任美國社會學會第一任主席，有美國社會學之父的尊稱。華德以後即受聘為社會學講座教授，並著述「宇宙大觀」一書，將其社

會學以外的論著蒐錄其中，該書各卷從一九一三年起先後出版。華德死於一九一三年，但其「宇宙大觀」至一九一八年始完全出版，這本書是他自幼接觸及喜愛大自然的結晶。

從磨坊工匠之子到大學教授，華德在清寒流浪的環境中刻苦奮鬥，他的成果是兩方面的：一是對於社會學及教育的貢獻；二是對大自然現象的研究與記錄。這兩方面的貢獻使華德名垂後世。

教學生涯

華德在一八六〇至一八六一年間曾擔任學校教師；及至成為著名的社會學家之後，即先後在各高等教育機構執教。他曾在哈特福特學社（Hartford Society）的社會學學院擔任推廣課程講師，曾任哥倫布大學（Columbian University）的植物學及社會學講師，並曾在利蘭斯坦福大學（Leland Stanford）、西維吉尼亞大學（West Virginia University）、威斯康辛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及歌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執教。一九〇六年以後，他受聘擔任布朗大學社會學講座，直至一九一三年去世為止。

在課堂中，華德的外表，並不特別能啟發學生的靈機，但是他的年齡、尊嚴、及廣博的知識，卻極有影響力量。學生在不知不覺中受到潛移默化，喜愛他，並受他人格的影響。他在布朗大學講授五種課程，其中之一為「教育的社會面」。該大學的學生大部份都選修華德的課程；華德在講課中反對自由放任的哲學，強調宇宙知識的整體綜合性。

華德的實際教學行為是其人格特徵的反映，而他生活中的軼事正是他人格特徵的說明。由於生活背景的影響，華德喜愛大自然中的事物，他甚至喜愛狂風、暴雨、及閃電，以為壯觀的宇宙事物值得推崇及描述。但是矯飾的事物失去本性或本質者，他就不甚喜愛。例如他喜愛植物及花，卻不喜重瓣花，因為他認為重瓣花已失去單純的本貌。他喜歡運動，但是反對任何具有暴力性質的運動，因為它失去了運動的和諧本質。

華德極少抽煙飲酒，平日工作及教學富於責任感，性情隨和，寬宏大量。他在演講及教學時，因為學識淵博而口若懸河，下筆也如行雲流水，但是一離正式場合卻無此才能，並拙於言談。

不分性別、種族、及地位，人人平等，人人參與工作，這是華德生活的準則，也是他教學的一項基本態度。他經常提著行李擠公共汽車，自己做事而無他人代勞。華德從小就生長在貧困的環境中，因此他沒有不良的社會階級觀念。

華德喜歡接觸的朋友和學生，都是熱愛知識的。他經常說：知識是世界上最有用的事物；雖然不同種族的人在智力方面有其差別，但是人人都能發展知識，享用社會遺產，並對人類社會有其貢獻。他以為一個人的家庭及社會背景不能限制其發展及成就，只要充實知識，任何人在社會上的成就機會都是平等的。

一九一〇年華德寫信給他的朋友說：「我喜歡工作；工作是使我幸福的主要源泉。工作產生了知識上的快樂、家庭生活的快樂、以及情緒上的快樂。」華德的生活史，事實上就是一部勤奮工作的歷

史。他的毅力是驚人的，從十九歲他開始寫日記，直到去世為止，從未間斷；他的日記內容包括他所有的思想、觀念、及生活細節。他很注意細節，甚至對於自己所用鉛筆的種類及數目，都有所記載。

寫作是華德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工作，在他晚年教學的生涯中，他仍然繼續不斷的寫作。他的教學工作永遠與研究工作協調融貫。他在晚年，計劃將他社會學以外的著作，全部整理蒐錄於「宇宙大觀」一書中。在他去世的前夕，「宇宙大觀」的第一卷才正式出版，使他得償宿願。

華德一生不好虛名，曾多次拒絕接受他人所授與的榮譽，但是卻很喜歡學生和其他學者對他的尊敬。華德一生窮困，凡事力求節儉，但是卻希望有一完美及設備良好的居所，以便與其他學者聚談。同時，在他教學生涯中，學生所給他的尊敬，增加了他無窮的生活樂趣。他記錄了下面幾件事情：一八九七年在芝加哥大學任教，學生送他一根金柄的手杖；一八九八年在西維吉尼亞大學任教，全班學生簽名，公開宣讀一份富麗堂皇的感謝狀，然後呈送給他；一八九九年在利蘭·斯坦福大學任教，學生送他名貴漂亮的手提包；在布朗大學任教，研究所全班同學送他一個極美麗的愛杯（即有兩個杯柄，以便輪飲的大銀酒杯。華德拒絕接受較高的榮譽，卻不厭其煩地記錄這些師生間的瑣事，正表示他注重師生之間的感情。從這些事例中也可看出，華德的學生如何尊敬他。

思想影響

華德的社會學思想對於教育理論與實際的影響，極為深遠。他在「社會動學」一書中論社會的進

化，以為人類利用「社會力量」，可以控制自然勢力，達成各種社會目的及理想。華德強調，人類社會力量中最重要者為慾望；慾望是人類各種活動的基礎。而人類的基本慾望包括三類：一為維持生命，二為延續生命，三為社會創生。人類為了維持生命，不斷勞動及發明，拓廣知識及理性；但也有很多人基於此種慾望，從事欺詐等不軌行為。人類為了延續生命，作育後嗣以傳宗接代，增強了社會意識；但也有很多人因此形成利己排他的觀念。至於人類的創生慾望，包括道德、審美、及知識，直接促成社會進步。在道德審美、及知識三方面，華德又特別強調知識的功能與重要性。

他認為有了知識，一切社會的動力便可用諸建設性及系統性的活動，以達成良好的社會目的。華德強調：人類的知識及思想能夠克服自然勢力，並加以控制及使用，而增加人類的幸福；同時，知識又能使社會上的種種靡費，減至最低限度。教育普及了知識，事實上就是一切社會進步的主要推動力量。

華德主張用教育力量導致社會進步，這種理論通常被稱為社會導進論（*Social telosis*）。他認為人類奮鬥的終極目標，是滿足慾望，獲得幸福。而達到幸福境界的途徑，共分為五個階層：進步、動力行為、動力思想、知識、及教育。換句話說，人類接受教育才能得到知識；有了知識才能發生動力思想；當動力思想化為動力行動的時候，才能形成社會的進步；由於社會進步，人類才能獲致幸福。華德明確的指出：教育是形成社會進步、滿足個人慾望、促致人類幸福的最根本途徑。

社會導進論，將社會進步與教育的關係解釋得相當詳細與合適。華德開創了現代社會學與教育學

關係的研究，使探討教育理論者，不僅重視教育的心理基礎及哲學基礎，同時也重視教育的社會基礎。雖然以後研究社會及教育之間關係者，不完全同意華德的理論，但是大家都同意他是此一研究領域的先導者。現在教育社會學非常發達，華德就是研究這門學問的始祖。

一般人對於教育的社會影響力量，常常有所爭論。有些人以為教育只能反應社會現況，因應調適，而無法改變社會現貌，形成變遷；華德則不以為然。他極力主張，教育力量能夠形成社會變遷，促成社會進步。這種思想以後經過杜威（John Dewey）的推崇，影響教育實際，形成所謂「社會中心教育」運動。這種運動首先在美國部分文化較落後的地區推展，以後則普遍實施。不僅美國推展此一教育運動，西歐國家及很多開發中的國家也普遍推展此一運動。

強調社會中心教育的學校，與社區保持了密切的關係。學校的教師以社區為教育環境，一方面以社區資源作為教學材料，另一方面則以改善社區生活作為本身的職責。社會中心學校的教師，不認為教育變遷是可有可無的需要，而將其視為教育過程中重要的一部分，因此深入社區生活，以便瞭解、調查、並研究社區的實際需要。在這種環境中，教師不是社區中的孤立者，而是社區關係的協調者。在社會中心學校中，教師的權威並不是培養學生公民能力的根據，相反地學生能從社區生活中學習公民所應具備的各種知識及能力。教師不僅是一個單純受人尊崇的人物，同時還是一個領導學生參與社區生活及社區行動的導師。

華德的思想強調教育促成社會進步的功能，開始了現代教育社會學的研究。同時在教育實際方面

，他的思想普遍為人接受之後，形成社會中心教育運動，使教師改變了他在社會中擔當的角色，不將自己孤立在校教室之中，而使自己領導學生參與社會生活，改造社會環境。華德這種貢獻，對促進教育與社會的關係，影響力量極為深遠。

結語

如果把華德的生活史作一個人格化的觀察，他從工匠之子到大學教授的奮鬥過程，就是一個最好的「教師」。華德珍惜他的教學生涯，重視師生之間的關係；在他的教學生涯中，可以看出他喜愛自然、勤奮工作、及改造社會的各種人格特徵。華德開始從教育的社會基礎方面加以研究，並賦予教師的角色一個新的定義，使教師從教室走向社會。教師不僅應該是傳道、授業、解惑的人，同時還應該是社會進步的解釋者及推動者。換言之，現代的教師不僅是經師、人師，同時還是社會的導師，這是華德的生活與思想，給予我們的一個明確的啟示。